

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 第十三种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Series, No. 13

图书馆、出版与教育： 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 (1928—1951)

Library, Publishing and Educat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n China (1928—1951)

王蕾 著
By Wang Le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 第十三种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Series, No. 13

图书馆、出版与教育： 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 (1928—1951)

Library, Publishing and Educat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n China (1928—1951)

王蕾 著

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 对本研究的支持！
哈佛燕京学社

TUSHUGUAN CHUBAN YU JIAOYU
HAFO-YANJING XUESHE ZAIHUA ZHONGGUO YANJIUSHI (1928-19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
史：1928—1951 / 王蕾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8.4

ISBN 978-7-5598-0844-8

I. ①图… II. ①王… III. ①高等教育—国际合
作—教育史—中国、美国—1928-1951 IV. ①G64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319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720 mm × 970 mm 1/16

印张：29.25 字数：435 千字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序

国学 (Chinese Learning)、汉学 (Sinology)、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 三者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区别, 盘根错节, 缠绕不清。由于研究群体及其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历史的诸多差异, 国学、汉学和中国研究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产生与发展道路。

国学, 顾名思义, 自然是中国人对本国学问的自称。这种称谓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产物。一般认为, 中文“国学”一词源于 1904 年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以“研究国学, 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和 1906 年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 其出发点是为了在学术文化上对抗西化。顾实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时曾对这种对抗作过十分生动的阐述: “海禁洞开, 外患荐至, 精神文明失其抗拒力, 物质文明闯入而横行。于是复有‘中文’‘西文’‘中学’‘西学’相对抗之名词。最近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 凡若‘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 不胫而走, 有口皆碑。而‘国学’一名词亦哇哇堕地产生。”(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一集)·序》,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正因为如此, 国学这个词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或者政

治色彩的学术划界或者学术隔离的故意。这种故意使得情感和理性的调适从一开始就失去平衡，情感时常战胜理性，以致国学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比较含糊，似是而非，充满不确定性。对此，钱穆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

国学以“国”称学，自然与国家密切相关。国家主要由国土、民族、政府和文化等基本要素构成，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虽然“国家”和“中国”这两个词在我国古已有之，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乃至中国观念，则大抵是在清末民初时才逐步形成的。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初期，中国学人对国家的认知颇有几分盲人摸象的意味，多是从某个或者某几个侧面去理解国家，因此国家一词在概念和观念上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中文“国家”一词与生俱来的，当西方的现代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后，中文的“国家”一词并不能完整地表达西方的国家观念，或者说中文的“国家”一词与西文的国家术语并不完全对应，时常具有多个指向。例如：英文中的“Country”、“State”、“Nation”在中文中都被译作国家，但是，这三个英文词在指向上实际各有侧重，“Country”侧重国土或疆域，“State”侧重政权或国家机器，而“Nation”则侧重国民或民族，因此，三者在使用上各有不同。可是，这三个英文词在中文中仅以“国家”一词笼而统之，自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或者不确定性。1910 年，梁启超在解读国家一词时说：“国家者，在一定土地之上，以权力而组织之人民团体也。”（梁启超《宪政浅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 22，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把英文的“Country”、“State”、“Nation”三词的意义有机地揉进了中文“国家”一词的解释之中。简而言之，中国人对现代国家观念的认知是从多个侧面逐渐走向全面的，国学亦然。

20 世纪 20 年代，国学研究开始进入大学，1922 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1924 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 年清华大学成立研

究院国学门,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9年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中以北京大学为最早,以清华大学为最盛。即使是大学的国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对国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甚至在校内也颇有质疑之声,例如:洪煊莲(洪业)对燕京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就颇不以为然,且一直持否定态度。虽然这些大学的国学研究机构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是昙花一现,但是对于今天国学研究的复兴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1925年成立,1929年即停办,只有短暂的四年时间,但是影响深远。在时隔80年之后,清华大学于2009年成立国学研究院,正是其国学研究传统的赓续。

时至今日,国学的概念仍然剪不断理还乱。人们时常笼而统之地将国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类: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国的全部学术思想和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指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的学问,且以经学为首。这种归纳也不过是研究范围大小的区分,并没有厘清国学的本质。正因为如此,各种国学研究群体大多是自说自话,各走各路,且殊途未必同归。

在各种国学的发展道路中,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及其传统似乎更能够显示国学可以延续的意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在研究院网站“院长致辞”栏目发表的《清华国学院的使命》一文中言:“‘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简称清华国学院)的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

化的成果和方法。……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反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这种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为基础,以世界的学术眼光去研究世界性的中国文化,而不是囿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国学,应该说才是国学应取之道。这也是国学从最初的与西方对抗最后走向与世界融合的必由之路。

汉学同样是一个有着不同指向的概念:一种是指明末清初兴起的以经学为中心,涉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等等,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因其师法汉代人研究经学重名物、训诂之传统,故而得名;另一种则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如欧洲汉学、美国汉学、东亚汉学等等。

中国的汉学在清朝鼎盛时曾经成为显学,清末时在西学的冲击下日渐式微,民国时一直在苟延残喘,但是已经病入膏肓,与近现代学术潮流格格不入。

外国的汉学(Sinology)则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产物。一般认为,外国的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其历史大致经历了发轫时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确立时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发展时期(19世纪中后期)和繁荣时期(20世纪)四个阶段。在发轫时期,有关中国的研究大多是传教士对中国的纪闻,流于表面,亦不系统。在确立时期,由于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的仪礼之争,迫使西方各派传教士开始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礼俗和文化,其中尤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成果最为突出。19世纪初,1814年12月11日,法国的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 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主持了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1818年,雷慕沙和德国的克拉勃罗德(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 1785—1835)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从此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得以确立。在发展时期,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各国纷纷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法国汉学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始发生改变,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其研究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并且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在繁荣时期,中国西部考古和敦煌遗书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西方的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等,汉学开始成为国际化的中国学问。

从地域上讲,外国的汉学又可分为东亚汉学、欧洲汉学和美国汉学。东亚汉学大抵因袭中国学术传统,与中国的传统学术差异不大。欧洲汉学则具有浓厚的西方学术色彩,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与中国的传统学术存在着较大差异。欧美的汉学同样也存在差异,相对而言,欧洲的汉学更加注重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而美国的汉学则更加注重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研究。

英文的“Sinology”(汉学)一词由“Sino”(中国的)和“logy”(—学)构成,意为中国的学问。“Sinology”一词大概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传入中国,被译作汉学,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虽然西方汉学是以作为中国主体的汉民族、汉语言、汉文化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把“Sinology”译作汉学总免不了名实不副,因为西方汉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汉民族,而且还包括了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换句话说,西方汉学研究的是整个中国的学问,而不单是汉民族的学问。因此,“Sinology”的意义应该是中国学,而不是汉学。然而,历史弄人,汉学一词也就一直将错就错沿用到今天。

西方的汉学以二战为界限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就古代汉学而言，一方面，西方的汉学与中国国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大同小异，因此汉学与国学存在着彼此缠绕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的汉学与中国国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上又颇为不同，因此汉学与国学又存在彼此似是而非的问题。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学兴起时，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学研究一直把中西文化融合作为其学术使命，且不断地糅合中国和西方的学术方法，以致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的汉学颇有趋于大同之势。尽管如此，学术发展的历史还是造就了名词术语的诸多混乱和困窘：

在中文名上，同样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人做的叫国学，外国人做的叫汉学；中国有汉学，外国也有汉学，此汉学又非彼汉学，风马牛不相及。这种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区分学术名称的现象在世界学术之林大概绝无仅有。

在英文名上，中国传统的汉学自然不能译为 Sinology，因为二者截然不同，不可张冠李戴，究竟该如何翻译就各显神通了。国学的英译也难倒了中国学界，Sinology 自然不妥，于是，有的译作 Chinese Studies，有的译作 China Studies，可是，二者皆似是而非，混淆了中外的区别；有的译作 National Studies，实在是不知所云。如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把国学译作 Chinese Learning，以区别于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和 China Studies。这种翻译虽然也有歧义，但是目前似乎还没有比此更好的翻译，因为 Chinese Learning 尚且具有“中国的学问”的意义，也不会与西方的相关术语相混淆。这也是本序言在起首处将国学的英文标注为“Chinese Learning”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 是20世纪以后汉学在美国兴起的产物。美国学界没有言必称学的陋习，有关国别的研究一般都称作某国研究，关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一般称作 Chinese Studies 或者 China Studies，且不喜欢沿用欧洲的 Sinology 一词，美国的中國研究机构也很少在名称上出现 Sinology 一词。换言之，在美国学界看来，有关中国的研究只是一门学问，而非一个学科。这体现了美国学界的严谨科学态

度,因为一国之内的学科是包罗万象的,而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归入一个相应的学科,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包罗万象之学。因此,中国学界时常将 Chinese Studies 和 China Studies 翻译为中国学,实在不然。

同时,美国对“国学”一词也不怎么认同。作为哈佛大学的合作伙伴,燕京大学于 1929 年模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时在美国的洪业对此颇不以为然,反对使用“国学”一词,认为学问无国界,不能孤芳自赏,应按学科分归各院校,并坚持主张中国的学问应由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1930 年洪业从美国返回中国后,力主解散国学研究所。1932 年燕京大学终因多种原因不得不正式撤销国学研究所。

美国的中国研究大致经历了兴起时期(20 世纪 20—40 年代)、发展时期(20 世纪 50—70 年代)和繁荣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三个阶段。在兴起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以私立大学为主导,以东亚图书馆的建立为基础,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现当代文化的研究二者并重。在发展时期,由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原因,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美国政府鼓励各大学开展中国研究,并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于是东亚研究机构开始在各公立大学广泛设立,研究的重点迅速转向有关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研究。在繁荣时期,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迅速崛起,美国的中国研究也不断深入,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更加全面、细致和丰富,不仅令欧洲各国难以望其项背,而且在诸多方面超过了中国。

欧洲的汉学发端于 16 世纪末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美国的中国研究则兴起于 20 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二者相距数百年。但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在二战以后迅速超过欧洲汉学,成为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心,且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固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但是,最为显见的当是美国独特的中国研究发展道路。

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兴起时,美国的中国研究

便开启了一条与欧洲汉学研究起步时迥然不同的独特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就是着力在美国和中国两地分别建立研究基地,以此为立足点和桥头堡,构建连接美国和中国的中国研究桥梁,并通过这座桥梁联合收集中国文献,共同培养研究人才,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协作进行学术交流,进而形成美国和中国两地的中国研究互为表里,遥相呼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学术研究共同体。这个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为20世纪美国的中国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在二战以后迅速崛起,并雄霸世界的根本之所在。

在20世纪20—40年代,美国在美建立的中国研究桥头堡是哈佛大学。由于霍尔遗产基金的原因,哈佛大学于1928年成立了独立的法人社团哈佛燕京学社,1929年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后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由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管理和拥有)。与此同时,哈佛燕京学社还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东亚系,创办了《亚洲研究》学术期刊。从此,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逐渐成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基石和连接美国与中国的中国研究桥头堡。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中美两地中国研究的总体规划、组织和协调,哈佛燕京图书馆则负责中国研究的藏书建设,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提供学术资源支持,二者犹如两个粒子组成的系统,虽然所处的中国研究学术空间不同,但是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量子纠缠”效应使得在中国研究上几乎是白手起家的哈佛大学从1928年起步开始就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在20世纪20—40年代,美国在华建立的中国研究桥头堡是燕京大学。哈佛大学在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同时,又积极寻求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最终选定燕京大学作为合作伙伴。哈佛大学以燕京大学作为其在华的中国研究桥头堡和影子中枢,在燕京大学设立北平办事处负责协调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在华事务,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设立哈佛购书处开展合作馆藏建设,在燕京大学设立引得编撰处负责中国研究资料索引的编制;在此基础上,重点在燕京大学开展

中国研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并以此为示范推进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教育。于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在中国研究上犹如两个彼此关联的粒子,每一个粒子的行为都会影响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共同构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独特的中美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这种哈佛与燕京的“量子纠缠”效应与哈佛大学内部的“量子纠缠”效应又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叠加态,遥相呼应,甚至一呼百应,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从起步开始就充满了颇有几分“蝴蝶效应”意味的能量,从而大放异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自然成为热点中的重点,而燕京大学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也备受关注,因此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研究者和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有的着力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有的专注于燕京大学的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学者的学术思想研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有关图书馆和图书馆人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如今,图书馆学与文献学青年学者王蕾博士十年磨一剑完成了《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1)》专著,正好弥补了这项学术阙如。

如前所述,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历史中,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一对彼此关联的粒子,二者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哈佛燕京学社扮演的是中国研究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扮演的则是中国研究的建设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哈佛燕京学社是通过项目申请和经费支持去延揽和集聚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共同开展中国研究,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则是通过收集丰富的文献资源去支撑和服务哈佛大学乃至美国的中国研究。如果没有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就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馆长裘开明的卓越贡献,哈佛燕京图书馆也不会成为欧美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历史不容假设,然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迅速成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景慕和向往的学术殿堂则是无可辩

驳的事实。费正清不仅坦陈除了哈佛大学的名声和优厚的待遇以外,哈佛燕京图书馆和裘开明馆长是吸引他去哈佛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最重要原因,而且还把自己到哈佛大学后出版的两本著作题献给馆长裘开明,感谢裘开明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并发自肺腑地称裘开明博士为西方汉学的引路人。这不仅是对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以裘开明馆长为代表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同仁的高度肯定、赞许和敬重,而且也是对哈佛燕京图书馆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肯定。所以,研究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历史,如果只关注哈佛燕京学社和与哈佛燕京学社相关的学者,而不重视或者忽视哈佛燕京图书馆,那就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

同样,在民国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史上,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也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粒子,二者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哈佛大学的作用是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整体规划、组织和协调中美两地的中国研究,以项目申请和经费支持的方式将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学者延揽和集聚到哈佛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燕京大学的作用则是通过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将一批中国的和外国的学者集聚到燕京大学,共同开展中国研究,人才培养,以此带动中国各地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人才培养,并利用中国学者的特长编纂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为全球的中国经典研究提供学术参考工具和便利。

更为重要的是,燕京大学图书馆犹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在华影子,二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一个文献资源建设的整体和支撑美国中国研究的平台。

在图书馆的管理上,两个图书馆均采用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编制的中文图书馆分类法和编目法,甚至在裘开明馆长来华做长期调研期间,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田洪都还应邀赴美,两地互换图书馆馆长,由此可见两个图书馆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藏书建设上,哈佛燕京图书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设立购书处,利用顾廷龙等一批中国文献通,在中国各地收集文献,凡是使用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在中国购买的文献,一本藏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另一本

则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如遇单本或者价格昂贵的珍本善本者则全部送往哈佛燕京图书馆。正是因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源源不断的文献资源输送,哈佛燕京图书馆才得以迅速建立起雄霸欧美的中文文献馆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燕京大学图书馆及其哈佛购书处诸多中国学者的全力支持,哈佛燕京图书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也不可能迅速崛起成为欧美东亚图书馆的翘楚。

在馆藏目录的编制上,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负责编制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分类卡片目录,而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田洪都则负责在北京印制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分类卡片目录,这项合作计划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延续,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以后才被迫终止。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分类卡片目录的联合印制看似是一项不起眼的图书馆业务合作,但是,其学术作用和意义重大而深远,因为民国时期北美甚至欧洲的东亚图书馆普遍缺乏采访和编目专业馆员,于是燕京大学图书馆负责印制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图书分类卡片目录一直是欧美东亚图书馆采购和编目中国研究文献资料的依据与范本,由此推动了欧美各东亚图书馆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欧美中国研究的发展。

上述史实及其相互关联在以往有关美国中国研究的历史研究中鲜有全面论述,如今王蕾博士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学术使命,劳苦功高,值得赞赏!

王蕾博士对于哈佛燕京学社中国研究历史的研究兴趣源于十二年前参与编纂《裘开明年谱》之时,2009年她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支持,开展“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与民国时期中外文献交流”项目的专题研究,研究成果获得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和学界的认可。其后,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特别邀请王蕾博士赴哈佛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专门研究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研究历史。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王蕾博士悉心查阅了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全部档案,甚至翻阅了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所有购书账册和清单,积累了十分丰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王蕾博

士完成了这部学术专著。

综上所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上,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犹如远隔重洋的两个粒子,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研究的系统,具有“量子纠缠”的效应。王蕾博士的著作《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1)》选择燕京大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极其丰富的档案史料和十分独到的学术视野,悉心地梳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史实,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学社在华的中国研究历史,阐述了哈佛燕京学社在华开展中国研究,以及与燕京大学中国教育、出版、图书馆等方面的各种错综复杂关系,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既填补了过去研究美国中国研究历史的阙如,又开辟了今后研究美国中国研究历史的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自然而然,这种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也就同时具有显著的“量子纠缠”学术效应:既然明确了哈佛燕京学社在华的中国研究历史,那么也就可以大致知道哈佛燕京学社在美的中国研究历史。

今年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90 周年,《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1)》的出版恰逢其时,可谓是中国学人的一份厚重学术献礼。

是为序。

程焕文

2018 年 4 月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程焕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

前言

承蒙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 (James K. M. Cheng) 先生的邀请和资助,我有幸于 2015 年 8 月赴哈佛燕京图书馆做一年的访问馆员,一方面参与郑炯文馆长领导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数字化项目工作,另一方面进一步开展有关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研究工作,完成本书的撰写,以便列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出版。

我对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研究兴趣源于十年前参与《裘开明年谱》的编撰工作。2006 年 9 月,我开始在职攻读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那时导师程焕文教授正在全力编撰《裘开明年谱》,以便向 2008 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 80 周年纪念献礼。在 2006 年至 2008 年间,我一直在参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档案资料的整理和《裘开明年谱》的编撰工作。导师程焕文教授应郑炯文馆长之邀于 2000 年开始从事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的研究工作,先后收集了几十个纸箱多达数万页有关裘开明先生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来源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档案馆、哈佛学院图书馆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东亚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内容丰富而繁杂,都是极其珍贵的一手资料,每次翻阅都会令人不禁产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裘开明 (Alfred K' aiming Ch' iu, 1898—1977) 是 20 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和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术大师。1918 年考入私立武昌文华大学, 1920 年文华图书科成立后, 师从“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女士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攻读图书馆学, 成为中国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本科生。1922 年毕业后担任厦门大学图书馆第一任馆长, 1925 年赴美留学, 先后获得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始参与哈佛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整理工作, 自 1928 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汉文文库主管 (the Custodian of th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和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 (the Librarian of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后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 馆长, 一手创办哈佛燕京图书馆, 并将哈佛燕京图书馆发展成为西方最大的东亚图书馆。1965 年退休以后创办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1966 年又创办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在图书分类学、编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领域融中国传统学术成就与西方近现代学术精华于一体, 开创了兼容并蓄的东亚图书馆学术体系。

在整理和翻译有关裘开明先生的档案资料过程中, 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在 1928 年至 1951 年间的发展历史引起了极大的研究兴趣。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成立于 1928 年, 是由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组成的国际著名汉学研究机构, 其经费来源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 (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 的遗产基金。本部设于哈佛大学, 在燕京大学设立北平办事处, 并设有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引得编纂处 (1931 年) 等相关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北平办事处的成立建立了哈佛大学与中国学术界的密切关系, 促进了中美文化与学术的密切交流与合作,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是中美大学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典范。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主要负责管理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的项目与活动联络和组织工作, 并维持与哈佛燕京学社, 以及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中大学等受